



切·格瓦拉传

[墨] 豪尔赫·G. 卡斯塔涅达 著 白凤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切·格瓦拉传

[墨] 豪尔赫·G. 卡斯塔涅达 著 白凤森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1356

Jorge Castañeda Gutman

LA VIDA EN ROJO. UNA BIOGRAFIA DE CHE GUEVARA

©Jorge Castañeda

c/o Guillermo Schavelzon & Asoc., Agencia Literar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格瓦拉传/(墨)卡斯塔涅达著;白凤森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汉译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08923-9

I. ①切… II. ①卡…②白… III. ①格瓦拉(1928—1967)—传记 IV. ①K837.51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1565 号

责任编辑 杨晓明 陈 昱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王玉川
责任印制 董文权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2 千字
开 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6.5 插页 8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923-9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关于本书

这种性质的研究必然需要大量资料。任何资料本身都不是完美和充分的；一切资料都有费解之处、都有缺欠和漏洞。即使表面上最无可指责的资料，诸如传记本身的主体信件、笔记和日记等，也有矛盾和保留之处：谁对自己是透明的呢？特别是涉及了一个高度政治性课题的时候，没有一份资料是中性的，所有资料都打着烙印。历史学家、传记作者或具有一丝不苟精神的普通作家的的工作，就在于对资料进行收集和比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依据大量资料，而不是从偏爱的或最容易得到的资料得出结论。

近年间，不同的切·格瓦拉生平研究者发掘出多种未发表的、或在他的一些著作的受限版本上发表的资料；这是颇有价值的，但不是最终的资料来源。这种性质的资料与证实了切在自己手稿中言论和著作的其他资料来源一起，在本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指的主要是他写给奇奇纳·费雷拉的信和所谓的《工业部纪录》和《革命战争片断——刚果》。对于当代任何对切·格瓦拉的研究来说，这些是第一笔新的和关键性的财富。

第二笔财富是直接或间接卷入切的生活和死亡的那些国家的国家档案。或者因为没有，或者因为没有开放，在古巴没有可利用的档案；这种情况唯一意味着：古巴对重大事件没有在任何严肃文论中留下有据可查的资料。或许哪一天，哈瓦那会决定根据它的档案，而不只是根据菲德尔·卡斯特罗大致详实而有独创性的回忆来讲述它的历史。暂时让其他档案，这些档案比较容易得到而且含有大量信息和证言，在本书中派上极大用场。这些档案属于美国、前苏联和英国三国政府。每一国的档案都值得简要评述一番。

在涉及与其自己历史有关的规则方面,美国经历了一个极大混乱的时期。许多档案已经公开,还有其他许多依然封存着。由于总统和大学藏书制度,已经公开的部分比较容易得到。由于信息自由和强制审查手续,封存的部分可以引用。本书引用的美国政府的所有档案和文献都可以供任何研究者使用,只要知道到哪里去找和有钱(确实不多)就能得到,或者通过总统藏书(特别是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肯尼迪藏书和得克萨斯州奥斯丁的约翰逊藏书),或者通过存放于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国家档案馆的国务院文件及其名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大致定期的出版物,最后,或者通过像大学出版社的《最新解密文件目录》这样的出版物,任何人都可以为这样的写作查阅已检查过的文件。有时候,这些资料有些部分被删掉了(除去了不良或有害成分);可以要求借阅修订本,有时候能借到,有时候不能。凡是以为在写作本书时有特权得到中央情报局或身在美国的人的档案的人,简直就是外行,没有史学和研究经验。

不难理解,英国的档案对于本书写作特别有用。第一,英国外交部在收集和保存电报和简报方面保持着堪称一流的严肃和专业的声誉,它依然是世界上最胜任的外交情报机构之一。第二,自从1961年1月美国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以后,英国驻哈瓦那大使馆遂在事实上成为华盛顿在哈瓦那的耳目。瑞士联邦确保官方上在哈瓦那代表美国的利益,而伦敦则在倾听、观察和分析哈瓦那的重大事件,并及时报告给华盛顿。第三,虽然外交部的简报在三十年代就在“丘·加登斯公共档案室”对所有人开放,而军情五处的简报只是在半个世纪后才公开,在许多情况下,具体到那些年的古巴来说,撰写前后简报的往往是同一个人。因此毫无疑问,发给女王陛下驻外机构的报告与发给女王陛下秘密机构的报告极其相似。

最后,还应该评述一下莫斯科的档案。如同大家知道的那样,自从改革,特别是苏联体制消失以后,苏联的档案就已经对外开放和有选择地、并非总是合理地拍卖。外交部的档案整理得很好,而且包含着史学家心目中的地道珍品。首先,苏联驻哈瓦那的不同官员,特别是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大使和奥列格·达鲁森科夫政务参赞与切·格瓦拉会谈的笔记,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只要得到一点点机构的支持,并且有钱支付得到所需(并非完全合理)的费用,这些档案1995年就已经向所有真正的研究者公开。

苏联共产党的档案控制得更加严格：费用更多，想得到要受更多限制，也更加不公平。同时，那里保存的许多文件是存放在外交部的文件的副本：前苏联党政不分的状况不会令任何人感到吃惊。

应该评述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资料来源，在于在本项研究过程中可以汇集到的采访和口述。我坚持认为，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主要人物说的和写的不一定都是真的。必须像对文件、统计数据甚至照片进行加工一样，对证言进行加工。为了撰写本书，在古巴、阿根廷、玻利维亚、莫斯科以及非常无关的地点采访了许多人。所有的采访都尽可能录了音，只是再现时对原话进行了综合和浓缩。有时候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录音，但采访有证人在场亲眼目睹：采访记录有第三者背书。在极少情况下，既不能录音也没有证人。在这种情况下，资料来源的真实性建立在研究者的行程、第三者安排的约会和提供证言的可信度上。为撰写本书进行的所有采访，任何另外一位研究者同样可以得到，只要设法进行并得到有关（出版社、大学或政治）机构的支持就行。

有些读者可能会想：一个没有经历过这里评述的时代、也不认识这里描写的人物的人，怎么敢讲述这段历史呢？我完全承认我的不足：切死亡时我还不满十五岁，他的壮举和不幸是在我懂事之前发生的。在更加成熟时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无疑会有许多事情要讲，而且有些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但是，时间上的间隔自有它的好处。我们没有经历那些可厌又辉煌岁月的人，或许能够比经受和享受那些岁月的人，更加客观和准确地讲述那些岁月。无论如何，所有权在这里没有效力：无论是好是坏，贯穿本书篇章的往昔属于我们大家所有。历史是它的主要人物创造的，是由作家撰写的，这是令人痛苦的、但却是无可争辩的尽人皆知的大道理。

目 录

关于本书	1
第一章 虽死犹生	1
第二章 恋爱和冷漠岁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庇隆和奇奇娜	26
第三章 最初的脚步:航行是必要的,生活不是必要的	46
第四章 与非德尔一起经历战火	80
第五章 格瓦拉在哈瓦那	120
第六章 “革命的大脑”苏联的幼儿	161
第七章 “不值得壮烈地死去”	197
第八章 跟非德尔,没有结婚,也没有离婚	235
第九章 切·格瓦拉的黑暗腹地	275
第十章 被谁在什么地方背叛了?	326
第十一章 死亡与复活	389
切:一部同意和不同意的读物	
——评豪尔赫·G.卡斯塔涅达的《切·格瓦拉传》..... 胡安·巴尔德斯·帕斯	408
译者的话	414

第一章

虽死犹生

人们擦干净他那安详明亮的脸，敞开他被四十年哮喘和在玻利维亚荒原一年饥饿折磨而死的胸膛。然后，把他放在马尔塔圣母医院的木槽里，托起他的头让大家能够看看那倒下的俘虏。重新放倒在混凝土地面后，人们给他解开从无花果村乘直升机之行期间捆绑他的绳子，请护士为他洗脸、梳头，甚至刮了蓄着的稀疏胡子。^①等到记者和好奇的村民开始列队走过时，情况已经完全变了：死亡前夕沮丧、暴躁和衣衫褴褛的那个人，已经变成了巴列格兰德村的基督，在他睁开的清澈眼睛中映出甘愿牺牲的安详。完成捕获最大战利品的时候，玻利维亚军队犯了他们唯一的错误。它把这个如此甘心而走投无路的革命者，这个完全合乎规矩地战败、裹着破衣烂衫、因为发怒和失败而脸色阴沉的尤罗峡谷的贫穷汉，变成了具有死亡之后的生命的基督形象。他的刽子手给了那个将传遍世界的神话以面庞、身躯和心灵。

仔细审视这些照片的人可能会理解，伊格拉小学校的格瓦拉怎么会变形为弗雷迪·阿尔沃塔捕捉到留给后世的、巴列格兰德受过宣福礼的偶像的。切的最清醒和最专业的捕获者加里·普拉多·萨尔蒙将军做出了解释：

^① “他满脸胡子。他头发很长，很长，这么长。头发很脏。衣服很脏，我们给换了。给他穿上了睡衣。医院的睡衣，我们给穿上了。”（苏珊娜·奥维多护士，会见作者，巴列格兰德，1994年10月27日。）

在法医的指示下,给他洗了身,穿了衣服,把他放下来。因为要显示身份,要向世界显示切已经战败;我们战胜了他。不是像一贯展示游击队员那样展示的事,那是在地面上,几具尸体,但是带着叫我受到极大冲击的表情,面部扭曲成这样。这是一个原因,让我把手绢放在切的颌下,让他别变形,就是这样。人们本能地想做的一切,就是显示这人就是切,就是能够说:“这就是他,我们打胜了。”这就是玻利维亚武装部队里有的情绪,我们打赢了战争。希望对他的身份没有怀疑,因为如果我们就让他原来那个样子,那么肮脏,破衣烂衫,头发凌乱,全身这副样子,就会还有怀疑。

追踪他的人显然没有预见到的是,同样的逻辑既适用于渴望抓到他的那些人,也适用于多年哀痛他的那些人。没有牺牲的观念,切·格瓦拉象征性的巨大影响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拥有荣耀、权力、家庭和舒适等一切的人,却为了换取一种思想而交出了这一切,而且既不气恼也不怀疑地交了出来。准备一死的意愿不是在切本人的演说或书信中,不是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悼词中,也不是在死后别人对牺牲的颂扬中得到证实的,而是在一个眼神中得到证实的:那就是死去的格瓦拉的眼神,那眼神看着杀害他的那些人并宽恕了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那眼神看着世界,对世界肯定地说,在为了理想而死的时候,他不感到痛苦。

如果是表情或举止里没有暴怒和沮丧的另一个格瓦拉,他就不会成为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象征。头发肮脏、衣服破烂、脚穿玻利维亚土制凉鞋、朋友和敌人都不认识的颓丧的格瓦拉,永远不会激发起巴列格兰德的牺牲者引起的那种好感和敬仰。

现存的被抓到的格瓦拉的三张照片,直到他被处决二十年后才流传,因为不管是拍摄其中一张的中央情报局摄影师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还是扔掉另外两张的阿纳尔多·萨乌赛多·帕拉达将军以前都没有传播过。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极坏的。既然在包围尤罗几天后人们接受切没有战死的说法,那么,隐藏起证明他已被蓄意处决的证据(即活着被捕的切的底片)方为上策。出于同样理由,这些镜头在90年代之前也没有在小银幕上公开。死去的格瓦拉令人信服,也没有责怪任何人,但却造就了一个道之不尽的神话;活着的格瓦拉充其量引发同情,但也使人对他的身份抱有怀疑,或者证

实那虽然尽人皆知、却不可告人的屠杀。基督形象占据上风留了下来，而另一个阴暗和破损的形象已经化为乌有了。

由于多种原因，埃内斯托·格瓦拉留在了整个一代人的社会想象中，但首先是通过人与其时代的神秘相遇才办到的。在60年代那愤怒和甜蜜的岁月，另一个人或许不会留下多少印迹；在不太动荡、不太理想主义和不太典范的另一个时代，即使格瓦拉也会默默无闻。格瓦拉作为值得关注、研究和解读的人物的存在，直接来自于他那一代人的履历。这样做的适宜性并非来自于格瓦拉的实践甚至思想，而是适应了一个历史阶段与一个人之间近乎完美的结合。另一种经历或许绝对不会抓住时代精神；而另一个历史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在像他那样的经历中被辨认出来。

这种存在的吻合是通过多种方式出现的。引导埃内斯托·格瓦拉一生的主线是张扬意志，近似于唯意志论，或者像某些人所说，近似于万能。在写给父母那封哑谜般的、纯净的告别信中，他本人就说到意志：“我怀着艺术家的乐趣磨炼出的意志，将会支撑松软的双腿和疲倦的肺脏。”从青年时期在科尔多瓦的橄榄球运动到他在玻利维亚丛林的磨难，他总是根据一个观点行事：只要想什么事就会发生什么事。对意志——他自己的意志和他在路上遇到的社会和个体参与者的意志而言，不存在不可避免的限制，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他的恋爱和旅行、他的政治观点以及他的军事和经济领导工作，都浸透着一种能经受各种考验的唯意志论，这种唯意志论将使他成就非凡的英雄壮举，将助他取得神奇的胜利，也将引导他走向多次以及最终致命的失败。这种几乎自我陶醉的唯意志论有着多种根源：他自己的渴望，他与哮喘病的持久抗争，含着永不消失的宠爱和自责感的无所不在的母亲的眼神。如果有人曾经相信：只要想，现在就能拥有世界，这个人就是切·格瓦拉。如果有什么在60年代描绘过它的时代旗手，那就是他的口号：*我们想要世界，而且现在就要。*^①

切一生的另一个指导原则，是永远拒绝与矛盾心理共处，从童年时期的哮喘病到年卡瓦苏，这个原则像他的影子一样一直追随着他。这个原则也

^① 原文为英语。

与一代人的根本特点相吻合。从很大程度上说,60年代意味着拒绝与生活的矛盾共处;目睹了战后第一代人的永远自我逃避,因为那一代人认为与矛盾的感情、愿望和政治目标共处是不可容忍的。除了切以外,谁还能更好地体现个人和一代人与矛盾心理不可融合、更好地象征与对立的冲动不能共处?

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著作包括他的榜样,属于现代历史的另一个阶段,这些东西很难在某一天重新具有现实意义。与切有关联的主要理论和政治观点,诸如武装斗争和游击中心、创造新人和精神刺激为主、战斗和互助的国际主义,实际上没有现实意义。由于人们拒绝大部分格瓦拉的意识形态遗产,他最大的胜利和他真正的成就——即古巴革命,正在痛苦地挣扎,或者说只是在侥幸存活。但怀旧情绪依然存在:恰帕斯山谷中萨帕塔游击队老练和走投无路的马科斯副司令,经常用文字或明确的语言求助于切的形象和类似切的人,特别是求助于让人想起背叛和失败的那些人。面对1995年2月9日墨西哥军队的攻势,他用两个偶像进行回击:奇纳梅卡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耶索涉渡口和尤罗山谷的切。^①

反之,格瓦拉尽职尽责并获得媒体赞扬的这个间歇期还没有结束。作为现代乌托邦的最后一声呼唤,作为我们时代伟大的高尚观念(诸如平等、互助、个人和集体的解放)与体现这些观念的男男女女的最后一次相遇,人们仍然在怀念这个时期。如今,切·格瓦拉与世界和生活的切合正在通过遥控的渗透得到证实。这种切合在于他那个时代价值观的现实性,在于60年代的希望和梦想对于一个世纪之末的重要性,而这个世纪之末已经没有乌托邦,没有集体的计划,并且已经被完美的意识形态单一性所特有的仇恨和紧张局势所打破。切扬名的时间比切自己的时间还要长久,而切把光明和意义给予了那个记忆正在暗淡、但仍然持久的时代。解开这个人和他的世界相遇的密码潜伏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潜伏在他的成熟期和死亡之时。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① 1919年,萨帕塔在奇纳梅卡庄园被包围和处决。在玻利维亚,切的游击纵队的后队在耶索涉渡口被消灭,当然,切在无花果村外尤罗山谷被俘虏。马科斯的公告载《战斗报》,墨西哥城,1995年2月25日。

大萧条前夕的阿根廷,不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不逢其时的国家,特别是作为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利亚·德拉塞尔纳-略萨的长子,来自一个尽管没有财帛、但从出身和血统上说的贵族之家。1928年6月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生于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当时该国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居民,很多人来自于其他地方。从父系上说,格瓦拉·林奇一家已经是南半球这块土地的第十二代,在一个绝大部分是新来的移民之国里,称为祖先也富富有余。从母系上说,也是根基深厚,声名显赫;除此之外,塞尔纳一家还拥有土地,因此有钱。

因为父亲的关系,小埃内斯托有西班牙、爱尔兰(帕特里克·林奇的曾祖父从英国逃到西班牙,18世纪下半叶又从西班牙逃到拉普拉塔河都督辖区)、甚至墨西哥—美国血统,因为切的祖母1868年生于加利福尼亚。格瓦拉·林奇的父亲罗伯托·格瓦拉也出生于美国:他的父母参加过1848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只是几年后带着子女回到了祖国。但是除了出生地以外,格瓦拉一家是地道的阿根廷人。家族中格瓦拉·林奇一支与当地贵族的历史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加斯帕尔·林奇是阿根廷农村协会(那是该国地主寡头真正的管理委员会)的创建者之一,恩里克·林奇在19世纪末摧残了当地农业的经济危机期间成了他的避难所之一。思想自由、反对传统观念的安娜·林奇,是切见过的唯一祖母,跟她的关系对切产生了深刻影响。1947年他决定学习医学而不学工程学,部分是因为安娜的死亡,因为临终前是他照料和伺候她。

从母系上看,他属于阿根廷人的身份可以上溯到何塞·德拉塞尔纳-伊诺霍萨将军,他是最后一位秘鲁总督,其军队在阿亚库乔战役中被苏克雷打败。塞利亚是胡安·马丁·德拉塞尔纳和埃德尔米拉·略萨的女儿,1927年与曾经学过建筑学的青年结婚,当时还不满二十一岁。她的父母早年亡故:堂胡安大约死于塞利亚出生之时,据他的一个孙女说,他在觉察自己染上梅毒时,就在远海上自杀;埃德尔米拉不久也亡故。塞利亚实际上由她的姐姐养大,姐姐名叫卡门·德拉塞尔纳,1928年与共产党诗人卡耶塔诺·科尔多瓦成婚,此前曾是墨西哥诗人亚马多·内尔沃的未婚妻。卡门和科尔多瓦都在阿根廷共产党队伍里待了十四年,卡门比科尔多瓦热情

还高。

像她丈夫面无羞色承认的那样，塞利亚家里“有钱”；父亲“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有好几个庄园。他受过教育，非常聪明，参加过激进派队伍”，投身于“1890年革命”。虽然家里财产应该在七个人中分配，但每个人也都分得不少。格瓦拉·德拉塞尔纳一家靠塞利亚的数笔租金和遗产生活，根本不靠一家之长那没头脑的、接连失败的创业计划生活。尽管塞利亚从母亲那里接受了圣心学校那种古典的天主教教育，但是，姐姐家里那种自由思想的、激进的或者干脆说左派氛围，很快就把她变成了另一个人：主张女权、拥护社会主义、反对教会。^①她参加在她家里举行的无尽无休的聚谈会，参加阿根廷妇女二十年代开展的多次斗争，^②而且婚前婚后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直到1965年去世为止。

至少在1955年切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于墨西哥相遇之前，在情感和精神方面，这位妇女无疑是她长子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无论他的父亲、妻子，还是子女，没有人在切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于他母亲那样的作用。作为与危险和癌症共处二十年的妇女，作为死前不久因为与儿子使用一个姓氏而入狱几个星期的战士，作为几乎靠自己教育和养活了五个子女的母亲，她给切·格瓦拉的生活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种印迹只有卡斯特罗在两个人生活的短暂间断期间留下的才能相比。与格瓦拉在刚果得到母亲去世消息时那撕心裂肺的悲恸相比，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说明他传说中的光荣和悲剧了：

然而，个人方面，（马查多·文图拉）给我带来了战争中最伤心的消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打来的电话说，我母亲病得很厉害，说话的声调让人推测，那只是预先告知……我在这种伤心的不确定中过

^① “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彻底的反教会思想。妈妈更彻底。她强烈地反对教会。”（罗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引自克劳迪娅·科洛尔，《切与阿根廷人》，布宜诺斯艾利斯，辩证法出版社，1985年。）

^② 1926年，阿根廷妇女争取到最早一些公民权，包括不经丈夫同意签订合同，遗孀对尚未独立生活的子女有支配权等。20年代的阿根廷有激烈的妇女运动——姑且不叫女权运动，运动多源自知识界和社会主义思潮，塞利亚·德拉塞尔纳和她姐姐卡门无疑与运动进行过接触。运动与维克托利亚·奥坎波和阿丰西娜·斯托尔尼等作家，以及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只是这项权利到1948年才在埃维塔·庇隆的推动下取得。参见《拉丁美洲的妇女、文化与政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了一个月,等待着我猜想的事情的结果,但又希望消息有误,直到最后证实母亲去世。她可能感到了自己的病情,本想在我动身前不久看看我,可是我的行程大大提前,已经不可能了。留在哈瓦那的给父母的告别信她没能看到,只是到10月公布了我的出行时才交给她。^①

他没能跟母亲告别,也没能像他的痛苦要求的那样守孝:因为非洲革命,因为残忍的热带疾病和帕特里斯·卢蒙巴政治后代长久的部落分裂,他没能这样做。塞利亚被从躺卧病床的医院赶了出来,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医院老板拒绝让三十七年前生下切·格瓦拉的母亲住在那里。由于内心着了魔的念头和从母亲那里继承的理想主义热情,他远离了第二祖国,在非洲忍着心中的哀痛。两年后他死了:两个人的死相距太近了。

1928年,得益于表面的经济安定甚至(不久便化为乌有的)政治安定,埃内斯托出生的阿根廷仍然蒸蒸日上,是个有活力的国家。但在二十年代,它真的可以与前英国白人领地和其他拉美国家相媲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主要社会人口指标更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相似,而与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或墨西哥不同。^② 阿根廷接受了比墨西哥或巴西高三倍的外国直接投资,人均铁路数量虽然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低50%,但远远超过西半球邻国。1913年,阿根廷人均收入在世界上占第十三位,略高于法国。欧洲战事和二十年代没有节制的扩张没能改变这样的排序。尽管阿根廷的薄弱环节,诸如工业化不足、外债负担沉重、出口部门高度脆弱等,很快使本国精英现代化的愿望化为泡影,但切·格瓦拉出生的国家仍表现出明显和应有的自信。它不顾已经开始显现的不利的经济和社会指标,颇

^① 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革命战争片断——刚果》,未发表的手稿。有著作引用了切关于刚果文章的很大部分,见帕科·伊格纳西奥·泰沃二世、费利克斯·格瓦拉和弗洛伊兰·罗德里格斯,《我们哪儿也没去的一年》,墨西哥,行星出版社,1994年。在这部著作谈到非洲的那一章,我们将大量引用切的手稿中完整的原话,是由慷慨的格瓦拉分子在哈瓦那提供给我们的(没有把抄件给我们,但允许我们就地阅读。),将得到的抄件与切几位密切合作者手中的抄件进行比较,证实了它的真实性。

^② 例如,当时阿根廷的儿童死亡率为121‰,哥伦比亚为177‰,墨西哥为228‰,智利为261‰,而澳大利亚为72‰。该国生活在大城市居民的比例达到31%,巴西的比例为10.7%,秘鲁为5%。(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经济史》,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

有理由地渴望加入尚未定型的第一世界。^①

1912年引进(阿根廷男子和公民)秘密普选的做法,促使公民联盟及其传奇式卫士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四年后赢得选举。1928年,切出生几个月后,在马塞洛·T.阿尔韦亚尔缺期后,伊里戈延得以再次当选。但是,伊里戈延政府未能满足它在国内新兴中产阶级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新工人阶级(这是一个由本土和移民第二代阿根廷人组成的折中的和不稳定的混合体)内部激起的极大希望。由于右派的压力、中产阶级的不满和大萧条造成的灾难,短暂的民主遂告结束:军队1930年发动20世纪第一次政变,把一个民主选举的拉美政府赶下台。武装部队扶植何塞·费利克斯·乌里武卢将军取代伊里戈延;乌里武卢的亲法西斯政策失败后,几届营私舞弊政府相继执政,直到1943年发生新的政变,这一时期才告结束。1983年以前,阿根廷政治生活的特点就是文人和军人政府轮流执政。

小埃内斯托生于罗萨里奥仅仅是事出偶然。一年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结婚之后,父母到了密西翁内斯省上巴拉那地区的卡拉瓜台港。老埃内斯托本想在那里种植和开发两百公顷马黛茶,马黛茶人称绿色金子,在阿根廷地区广泛种植。^②塞利亚已经怀孕八个月,夫妻二人又到了罗萨里奥,那是一个比较近的有些规模的城市,想在那里生下孩子,同时看看能不能买一座磨马黛茶的工厂。种植和制作马黛茶的创业计划不久就失败了,后来几年也经常是这样。母亲怀孕刚满八个月便生下小埃内斯托,身体虚弱,还要像他一生经历的那样经常更换住处。不久,一家人离开密西翁内斯地区。格瓦密拉密·林奇还是一家木料厂的合伙人,他得在靠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圣伊西多罗照料木料厂。

① “20年代期间,阿根廷几乎每年都取得坚实的工业增长……耐用和非耐用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生产快速扩张,但牺牲了农业。中间产业也发展很快,如炼油业、化学工业和钢铁业;只有建筑业低于战前水平。”(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经济史》,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关于可以用来在卡拉瓜台港种植马黛茶的资金来源,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本人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说法。在他《我的儿子切》这本书里说,他得到父亲的一笔遗产,想用来在密西翁内斯购买土地。这个说法被一个古巴官方消息来源所引用,即《埃内斯托·格瓦拉历史、传记和军事图册》,第一卷,1990年哈瓦那出版。但是,在一篇与何塞·格里古列维奇的长篇会见记中,切的父亲的原话是:“塞利亚在密西翁内斯继承了一个种植园。”会见记收入L.拉弗莱茨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6年。

1930年5月2日,小埃内斯托不到两岁时,第一次哮喘发作了。据他父亲说,他妻子是个熟练和不可救药的爱游泳的女人,常常带着儿子去拉普拉塔河岸边圣伊西多罗游泳俱乐部去游泳。病儿的父亲几乎毫不怀疑自己对灾难负有责任:

一个寒冷的5月早晨,还刮着大风,我妻子带着我们的儿子埃内斯托去河里游泳。我到俱乐部去找他们,要带他们去吃午饭,发现孩子穿着游泳衣,出了水待在外面,瑟瑟发抖。塞利亚没有经验,没有注意到天气变化在一年的那个时候对孩子是危险的。^①

但这不是切第一次闹肺病,出生四十天时,他得了一次肺炎,他姑姑埃尔西莉亚·格瓦拉·林奇说,因为这场病他“差一点儿死了”。这第一次呼吸系统感染对于父亲关于切哮喘病因的解释提出了怀疑,所说的感冒不是没有前因的。不管怎么说,在父母亲看来,从在拉普拉塔河边第一次发作到1933年6月,小埃内斯托的哮喘几乎是经常发作,令人苦恼,伤害极大。但首先是塞利亚这样认为,除了照看病儿的巨大负担以外,她还有极大的负罪感。除了因为河里的事丈夫归罪于她以外,还有遗传这个前因,当时对这种原因只是猜疑,现在人们才认识清楚。塞利亚从小患哮喘,这使她的子女有30%的可能性罹患这种疾病。一切迹象表明,埃内斯托就是这种情况。出生四十天的肺炎和游泳俱乐部的感冒,可能起了触发高度遗传倾向的作用,但没有引发他的哮喘。

在病情出现与得到稳定之间经过的三年,似乎在夫妻身上、也间接在孩子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影响;家人、朋友和切的父母本人对这种影响的说法令人感动。^②毫无疑问,就是在那个时期,塞利亚形成了对儿子着迷、负罪和溺爱的复杂心理。不久后,这种心理又把一种家庭教育包括进来,而切·格

^① 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在另一个版本中,老格瓦拉变换了角色,但坚持对过错的认定:“1930年5月2日,塞利亚和我带着娃娃去水池游泳。天气冷下来,还刮风,娃娃突然咳嗽起来。我们带他去看病,医生诊断是哮喘。说不定是感冒了,也许那病是遗传的,塞利亚小时候就得过哮喘。”

^② 例如,切的母亲本人确认父亲是怎样精心照看孩子的:“埃内斯托四岁时就受不了首都的气候。格瓦拉·林奇(分居后她就这样称她的丈夫)习惯了坐着睡在大儿子的床头,让他靠在他胸前,不那么痛苦地忍受哮喘。”(塞利亚·德拉塞尔纳的证言,载《格拉玛报》,哈瓦那。塞利亚死于1965年4月19日,此证言显然收集于发表前几年。)

瓦拉呢,在整个一生中,都把自己无穷无尽的读书乐趣和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望归功于这种教育。

整整五年时光,一家人在阿根廷多处奔走,寻找一处有益于孩子身体、或至少不会加重病情的居所。最后在上格拉西亚找到了,那是一座距离科尔多瓦市四十公里的避暑小镇,坐落在六百米高奇卡山的山坡上。那里吸引游客和结核病患者干燥、清洁和透明的空气,虽然没有完全治好他的哮喘,也没有拉长发作的间隔,但还是减轻了发作程度。由于上格拉西亚的气候、医生的照料和孩子的特质,病情变得可以控制了。还有,特别是多亏了母亲给予的奉献和精心照料。

在科尔多瓦山脚下那座神奇的山中,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一点点生长,父亲致力于在小城镇建造房屋,母亲全力抚养和教育埃内斯托及其塞利亚和安娜·玛丽娅两个妹妹和弟弟罗伯特。格瓦拉·德拉塞尔纳一家最小的孩子胡安·马丁,是后来在科尔多瓦生的。所有这一切构成一片自省和恬静的绿洲,镶嵌在一个正在告别黄金岁月、并和世界一起步入萧条的灾难以及其预料不到的政治后果的国家中。

1929年的世界性危机不仅摧毁了切的父亲对马黛茶的预期,而且打破了关于安适、繁荣的阿根廷的神话。1930年的政变造成一个漫长的政治不稳定时期,阿根廷大宗出口产品价格和国际需求的下跌造成经济长期不振,只在“二战”刚结束时才因原料产品短期繁荣而中止。但是,这次危机也开启了一个社会动员、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和文化变革的时期,而无论是上格拉西亚还是像科尔多瓦这些外省受保护的和有知识的精英,都不能对这些无动于衷。

例如,最初,阿根廷产品的对外销售没有像智利铜和巴西咖啡那样下降。尽管如此,阿根廷的出口收入在1929年至1932年还是减少了近50%,经济崩溃造成的破坏和后果并不亚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这次崩溃在阿根廷社会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危机造成农业部门大量失业——基本上是不能履行合同条款的佃农;外汇和外国信贷稀少对进口的限制推动了国内制造业(既有消费品也有某些设备制造部门)的发展。而这种现象促进了阿根廷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两个数据表明了这些年间的社会变化:到1947年,一百四十万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五十